本书所收录的几篇文章，都是围绕着中国的“内亚”视角展开讨论的：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内徙内亚人群，一方面固然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，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继承和坚持某些内亚的文化传统。首先特别需要对“内亚”（Inner Asia）的定义做一个简单的说明，本书中作者没有对此下清晰地定义，容易让不知情者与“中亚”弄混。实际上，“内亚”是一个外来语，最先使用于西方历史学研究中，在广义上常用来指代东起亚洲东北部海岸线，西抵里海的广阔地域上由数个地理单元组成的区域，而在狭义上则常用指代中国西-北的边疆地带。本文是在其广义上使用的。

《黑毡上的北魏皇帝》是本书的同名文章，在此文中，作者罗新比较系统地提出了“作为方法的内亚视角”。本文的结构安排也可视为全书其他文章的一个典型，首先作者从一个比较小的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不常被注意到的细节——北魏登基典礼上的黑毡——谈起，广泛的引用各种文献、一手或二手资料，以发掘出一个比较可信历史事实，这一历史的考证过程往往占据了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。接着作者便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，“内亚作为一个方法”，即注意到内亚传统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连续性，在考察历史时区别于中国传统。放在北魏问题上来说，“内亚”观在于看到北魏皇帝不仅是华夏文化的皇帝，也是内亚游牧征服集团的可汗，他们的历史活动是多种文化传统碰撞、融合的结果。由此，我们在审视北魏、元以及清代等异族政权时，能够以更全面的视野，超越常用的“汉化”视角来分析问题，看到历史更丰富的一面。不过作者的分析仅仅止步于此，在提出了方法之后没有在“内亚”视角上开展进一步的分析，为读者做一个示范，如探寻“内亚”和“华夏”是否存在文化上高低的区别，“内亚性”是否具有某种同质性因素等等。这一点相当可惜。

第二篇文章《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》沿用了上文中的行文结构以及思路，作者探寻了北魏祭天大典中祭坛上所树的木杆的属性、功能和来历，最后得出结论，这一木杆源自内亚而非华夏传统。这一考察是作者“内亚”方法的一个实例，但除了理清历史角落的一个不太重要的细节外，没有更多的价值。

在《内亚视角的北朝史》中，作者将“内亚”方法带入到了前人研究的评论中，指出，过往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与异族相关的史料时，即使注重内亚传统，但也是为了解释华夏的历史，并不具有“真正意义上的内亚关怀”。在作者看来，“内亚视角的北朝史”指的是通过对北朝某一问题的研究，而从某一角度或在某一局部照亮内亚史，从而丰富对内亚传统的认识。此或可看作传统“中华本位”的镜像面。其实也就是从北朝史料中“发现中国”还是“发现内亚”的问题，与其说是“内亚视角的中国史”（作者语），毋宁说是“中国视角的内亚史”。如果没有志于研究内亚，而只是想研究中国的学者，“内亚视角的北朝史”不是也没有必要成为选项之一。

最后一篇文章是《耶律阿保机之死》，作者给出了关于“扶余之变”的一种新解释，认为耶律阿保机是受制于内亚立汗仪式传统，而不得不死。虽然作者的推理可自成逻辑，但毕竟是推理大于实证，没有突破性地、决定性地史料证据作为支撑，可视为一种比较可信的推测，但却不是真相的唯一可能。

末尾，再额外谈谈笔者对本文中的一点细节的担忧。作者从《魏书》与西魏史料对孝武帝即位仪式的记载，分析出其中两种彼此矛盾的矛盾的写作动机：强调孝武帝的法统和讥讽高欢行事不合中原传统，进而认为，这“昭显了那个时代的北方社会，在价值观、文化情感和传统认同方面，存在着多么深刻的破碎和分裂”。可是，文化的融合过程本就是矛盾与和谐并存，多种色彩杂糅的，“矛盾”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既难以谈得上“破碎和分裂”，更不是什么“深刻”。作者在这里显然有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“刻意拔高”乃至“无中生有”之嫌，犯了所谓的“滑坡谬误”。这也是许多研究中所存在的通病，故特此提出。